

汉族为什么五十个少数民族中的第一大族，如今
称之为少数民族，为什么就会少了那么多人情浪漫
注重生命的孝顺以及遵守传统民族文化呢？是现代大
众、城市生活节奏太快、心理太浮躁还是其
它的原因？是否这从本是一个自然法则，假如一块
处女地一旦被开垦，也意味着不得不开始的不再原
始神秘的不再神秘的能力！

杨家鸣 著

橙黄橘绿

YANGJIAMING
CHENHUANG
JULU

橙 黄 橘 绿

杨家鸣 著

西藏之旅



1995年8月摄于西藏雅鲁藏布江畔



2007年12月摄于延安南泥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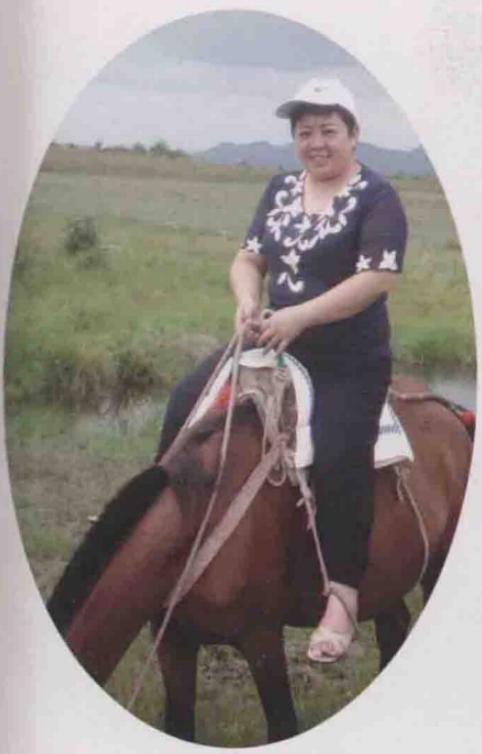


2007年12月摄于山西壶口瀑布



2007年6月摄于遵义董公寺烂田村





2008年5月摄于贵州龙里大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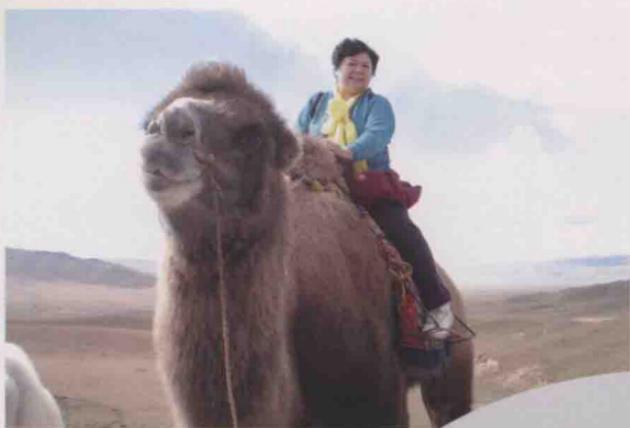


2008年6月摄于北戴河



2008年5月摄于贵州龙里大草原
本文档由宇文霞提供，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使用或传播。购买：www.eztongbo.com

2009年10月摄于青海日月山



2008年6月摄于北戴河



2008年10月摄于青海湖畔

一个文学女性的正道直行

尧玉麟

1

杨家鸣将她近年的作品选了二十多篇邮来，说是准备出书，还说要对过去的写作做个了结，以后不想这样写了；要转变思路，换种写法等等。

当前文学式微，文坛乱象频生，让文学界颇多沮丧；这种情形下，还有如此真诚对待文学，一如既往耕耘出书者，的确是件让人高兴的事。

接下来她很客气的提出，帮她改一下，还要写篇序。

我马上就想推，原因简单。我自己没出过书，还帮人家序什么“序”！

文章，我肯定会看，而且，会认真看，但“序”就不写了。

杨家鸣不管不顾，就这么不停地打手机。

当时，夜已经很深很沉，我住居的地方是清寂无声。

我一面在网上读着她的文章，一面听着电话。

你很难相信，这是一个过了“知天命”年纪的女人。

这定然是个率性而挚着的女人，对自己要做的事，十分投入；虽然性情急躁了点，但心地纯正。

我只好答复她：等看完后再说！

杨家鸣属于新闻从业人员，自参加工作以来就在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做编辑，一度做到电台总编室主任；四十八岁那年，应聘到遵义市安全生产监督局，承担“全生产监督”内部刊物的文字编辑还有采访。

无论电台还是“内刊”，都是党的宣传工具，尤其电台，一向有“喉舌”之称，在喉舌里进出的人，大体都该是党员，杨家鸣却不是。

2008年，红花岗区委区政府决定出一本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艺作品选；我负责文学部分选了她两篇文章，按要求需写作者简介；她写的简介里有两句：非党非团，无党无派。过后，大概觉得不妥，立马打电话，到处找我。当时，我在外地，手机无法接通，她就发短信。后来接通了，又再三再四叮嘱一定要给她改过来。直到我明确的告诉她，放心，我会按规定格式处理。她才松口气似的，连声说谢谢！谢谢！

这就是跟我打交道的杨家鸣，也是我直接接触的杨家鸣！

当然，接触最多的，是她的作品。杨家鸣能写，写了不少，出手也快。进入本世纪，连续出版过两本个人集子：《昨天的太阳》，《我行我歌》。

由她的文章中，我看到了一个文学女性对文学的敬重和谦卑，同时又有一份清醒一份独立；不拔高，不跟风，只忠诚于自己心灵对文学的感觉和认知。

2

文学人才难得，文学女才，就更为罕见。我对生产文字的女子一向怀有敬意，三十年代的肖红、丁玲还有四十年代的张爱玲，都是我喜爱的女作家。

男人写东西已不容易，女人来做这事，更有一番滋味。写字有如生孩子，怀胎十月，备尝艰辛，一朝分娩，同样九死一生。

正因如此，我从不轻易鼓励女孩子写作；不仅不鼓励，对一些女孩，还给以打击，有时候打得还很冷酷，就是想让她们

趁早熄灭念头。

但是，对那些发自心底对文学的向往，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已然显露了文学潜质和某种天赋的，又非常珍惜，生怕她们停止下来，荒疏了才华。

2008年9月19日，在“女性文学暨红花岗区女性写作研讨会”上，杨家鸣有个发言，开头一句是这样的：“文学对我来说，就是少女的初恋情人”。

初恋，对于正常的少年少女来讲，无论短暂还是持久，无论热烈还是羞涩，都一样的神圣。未经世俗的烟熏火燎，也没有进行任何物质性的成本核算，完全出自本色，情愫天然，美好而纯正。有的人，会因此一辈子铭刻于心，凭借这份圣洁的情感，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对声色犬马的诱惑，能做到常人很难做到的事；比如守身如玉，比如“拒腐蚀，永不沾”！

把文学这样来比喻，是真把文学当回事了。

发言的最后，杨家鸣说，我用我所喜欢的一个女诗人的诗来结束。

这时，我感觉到她也许会用舒婷。

果然，她引用了舒婷的《也许》。

就在会场上，情不自禁地跟她一道背诵起来：

也许，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

也许，路开始已错，结果还是错；

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

也许，燃尽生命，烛照黑暗，身边却没有取暖的火

.....

这是舒婷写于1979年的诗。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舒婷同所有被称为“新时期”作家一样，满怀着对民族对国家对现实生活的深情关注；社会上有个什么事，第一时间就有作品出来说话；激情横溢，憎爱分明，充分表现出一个作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和良知。后来，忽然像人间蒸发，老百姓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了。一如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中所言：“聪明年轻的一代，

只图消费享受，而曾为灵性良心奋斗的人，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灰心绝望，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无可奈何的空虚。上帝已不在其位，财神爷当道了。”

杨家鸣显然是清楚这一点的，不然，她也不会把三十年前舒婷写下的《也许》拿到今天的会上来念。

尽管“身边没有取暖的火”，她依然坚守着文学的固有立场，该怎么写还怎么写，该怎么反映还怎么反映。她去青海旅游，在礼赞青藏高原风光的同时，又不禁对青海湖的未来深深忧虑。在《让我欢喜让我愁的青海湖》一文里，她写道：“近年来青海湖水位正以每年 10 厘米的速度急剧下降。有专家做出预言：如果不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青海湖的湟鱼会‘黄’，鸟岛会‘倒’，青海湖将在青藏高原上‘彻底蒸发’，成为又一个‘罗布泊’！……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现状，多么不愿意相信的事实！是否这早已成为了一个习以为常的规律：原生态的名山胜水一旦被开发利用，便意味着从此告别清纯与童贞呢？！站在美丽的青海湖畔，我不禁为她的未来忧心忡忡。”

杨家鸣总是这样的直抒胸臆，毫不隐瞒自己的爱恨情仇。《在国殇的日子里》，她如实地写自己的出游，用这样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和“5·12”大地震的关系；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去观察民间对灾难的态度和普通百姓的反应，这角度是比较刁的，但“成像”非常可靠。反思的结果也令人信服“一时间自己这个无党无派且不热衷政治的人，开始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的民族有了全新的发现和深刻的认识！……而过去我多少片面地看重了现实中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其实，生于斯长于斯，稍有良知的人谁有理由不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谁敢说他个人的命运不和自己的国家民族血肉相连？！却原来，不满有时是一份良好的愿望，一种向上的希冀，也是一份最深沉炽热的情感！”

火一样的语言火一样的激情，“文如其人”如斯者，这女子是其一！

对社会的不公不平种种丑恶与负面，杨家鸣也愤懑也不满

生活的五花八门，同样围绕着这个看上去什么都不在乎的“马大哈”。

《谁来告诉我》一文既直率又含蓄地表达了她的这种困惑。一面是“追求纯真与完美”的知识女性，“具有良知、富于激情”，她们“总是不懂得伪装和设防，不会随波逐流溜须拍马，眼睛里容不得半粒沙”，于是在“生活中屡屡碰壁与撞墙”；而在另一面，那些“聪明”女人，把男人看做“一只只愚钝的困兽，而她们均是技高一筹的训兽师”。“只须轻轻抛出女人的武器，扮演他们善解人意的知己或妩媚动人的少女，对方往往就服服帖帖与束手就擒”。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她们“没什么人格、尊严可言，也不必事事认真和较劲生气；渴望中的金钱、汽车、别墅均可梦想成真！她们甚至根本不相信爱情，只须懂得资源互换、适者生存的基本原理！”

知识女性们对此看得很明白，她们“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却禁不住一次次地叩问灵魂：作为女人当中的另类，置身于商品浪潮的滚滚红尘间，不知到底是悲还是喜？！”

读过她这些作品，不得不承认，她在对世风的抨击时，也不无忧虑。东西写得真，人也真。

3

杨家鸣好动，喜欢到处走。才听说从云南回来，却又去了青海。而且，每到一处，总有斩获。比如游滇西，几乎是走到哪写到哪；腾冲和顺云峰山，瑞丽畹町缅甸一日游，一道来，还都有自己的发现。这些地方，我也去过，还不止一次，却少有像她那样的发现。比如缅甸边境的木姐小城，知道有人妖，却不知道在哪里表演。杨家鸣不仅知道花 60 块钱就能看 40 分钟表演，还知道再花 100 块小费，人妖便可以脱掉裤衩，把那因吃药变性极度萎缩的男性命根拿给你看。正因为这样的丑陋和低级，杨家鸣放弃了去看人妖表演的念头。

这些年，杨家鸣的散文游记，多了不少看点；知识性趣味

性的东西多了，手法也正向多样化延伸，文学性强了。

更让我感兴趣的是，她近期作品在精神层面上出现的变化；尽管很细微，有的就是那么一点，跟萤火虫的光亮一样，但这是文学的光焰，有着惊人的效果；在当前物欲之海几乎淹没一切，世界充满庸俗浮躁的喧嚣，一个文学女子不经意间传递出来的声音，虽然微弱，却有一种清新，它是性灵的呼唤，如空谷足音，让人为之一振。

她的思维发生了改变，创作便有意无意地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

杨家鸣几次云游青藏高原，也曾进入西藏，各大寺庙，她似乎都游历过。但过去的文章，反映出来的东西，烟火味依然很重。这一回去青海，东西虽然是“现赶出来”的，却有了变化。《鬼魅神奇的坎布拉》里，她这样向我们描述她的感受：“一行人被一路的景色震撼得傻呆呆、静悄悄的：头上是无边无际的蓝天，蓝天上飘散着大朵大朵的浮云，四周是千奇百怪、神秘鬼魅的岩石，而远方是一个山水迷茫、仿佛永远无法企及的村庄。呵，没有喧嚣没有纷扰，没有粉饰更没有人工雕琢，天地山水宛如初生、纯洁无暇、浑然一体。寂静，出奇地寂静，除了流水声和偶尔一两声鸟鸣，时光在这里似乎已经凝固，而尘世间所有的烦忧都远去了！没有过昨天，也不必憧憬未来，唯有千年的寂静与无边的洪荒。脑海里仅剩下一个念头，或幻化成湖边的一块无拘无束的岩石，或演变成湖里的一条自由自在的鱼儿，地老天荒地居住在这里，与草木一起枯荣，与山水生死相依……”

读着这些文字，我不由想起曾经的女歌手周鹏。这个“80”后女孩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飘荡在北京广州这些大都会进行商业演唱，也就是通称的“走穴”，面对舞台上下滚滚烟尘以及光怪陆离的诱惑和陷阱，她的灵魂在挣扎，心里在喊不！却没人理会。最后去了西藏，由扎什伦布寺出来，头顶一片圣洁的蓝天，她似乎下了决心，走自己的路，自己把自己顶起来！这样，取了个艺名萨顶顶。

2008年夏天，萨顶顶在伦敦一唱走红，斩获“BBC世界音乐大奖”亚洲第一歌手称号。随后的个人专场演出，一下将英国阿尔波特皇家剧院踩在脚底；原因是，这家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皇家剧院从不接受商业性演出，萨顶顶打进去了，成为一项“世界记录”。BBC电台逍遥音乐节首开先河为她进行全球直播，又是一项“世界记录”。此后一年多，她不停地从这个洲飞到那个洲；飞到哪里，歌碟就发到那里，包括商业演出竞争最激烈的美国。如今，在地球村这个圈子里，她有了自己的歌迷。

萨顶顶的成功，当然是自身音乐条件，嗓子好，能作曲，又能填词。但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女孩，在今天的中国，应该说不少。把藏传佛教引进音乐，之前也有人做过，萨顶顶无疑走得最远。她歌曲中传递出来的那种神性，温婉美妙，纯净自然。她一直用东方语言演唱，汉语藏语梵语；西方人听不懂歌词，却听懂了音乐。

林廓的人啊 人山人海
弘嘛呢呗呗弘
可我的人儿啊怎么不见了 怎么不见了
弘嘛呢呗呗弘

这是她唱的一首题名《神香》的歌词，“人儿”在这里只是一种意象；实际上她的所有歌曲几乎不谈爱情，根本不说男女之间那点事。她只专注心灵的倾诉，灵魂的表白。“弘嘛呢呗呗弘”明显脱胎于佛咒“俺嘛呢叭咪訇”，这是佛教真经，又叫六字真言，简单说就是皈依三宝，六根清净。宗教神性融入她的歌唱，假传万卷书，真传一句话。一个二十多岁的娱乐女孩唱歌的同时每日打坐，天天颂经；定然是参到了什么，悟到了什么，才使自己的创作和演唱灵感不断。也许，真传就在这里。

萨顶顶的演唱，有个启示异常清晰，人性和佛性相通。

现代生活的物质海洋，波诡云谲，变幻莫测，人往往容易迷失；迷失人性，迷失价值，精神找不到寄托，灵魂无处安顿，这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茫茫一片文化沙漠，心在向往着绿洲；于是有了穿越时空的梦幻，荒诞又神秘，传奇又普通。这就是人类，永远在矛盾，永远在梦想，永远在行走，永远在寻求。萨顶顶用一个简单的音乐童话，折射出人类返璞归真的童心，世界听懂了！

这是当代人文精神的一种大情怀，反映在文学创作中，是一种博大深厚的人类意识。它是写作的难度，也是写作的高度。文学是心灵的艺术，假如你对它够诚实，走到一定的时候，无须刻意，自然而然会同冥冥中的某种神性链接。

远到青海，近到黔东南，杨家鸣一些游记有意无意间透出了这份神秘。当然她自己不知道，还是懵里懵懂的，所以，常常大为不解：“为什么世间许多离奇古怪、不可思议的东西总是源于少数民族？！究竟是他们先天的聪颖智慧还是他们善于发明创造或者是距离神明更近呢？”这是《占里生育之秘》中，她自己给自己提出的命题。

黔东南的占里侗寨，有个近乎神话的生育现象，业已延续一千多年：“自古以来，占里人都恪守着一个古老的生育观：一对夫妻一生只生一男一女；在这里，谁家多生一个小孩，就会被寨上的人们视为多生一个‘强盗’而无脸见人。”秘密“就在一种叫做‘换花草’的草药里，专用于平衡胎儿性别”。杨家鸣没有能亲自去占里，为此跺脚。回到家专门查阅资料，证实了这一切的确是真的！

仔细想来，人生其实就两件事，一个是生，一个是死。一切智者从不忌讳谈论生死。毛泽东在他的晚年，就经常提起这样的话题，包括他自己可能出现的五种死法。他说，人是要死的，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

人死后必须把尸体处理掉，于是，人类有了丧葬。古代，帝王尸体的处理，那是超级无敌的讲究。有的人坐上皇位那天，便开始为自个打造坟墓；从秦始皇到康熙乾隆都这样，一个墓

往往造几十年，多少民脂民膏就这样被尔等玩完。

杨家鸣在《原生态的苗寨》里，把一个普普通通的苗族村寨对后事的处理，标本一样展示在众人面前，简直就是现代文明处理丧事上的最佳教案。这篇文章充分显示出作者的叙述才华，平铺直叙，却能吸引眼球。

岜沙，这个苗族村寨，距离从江县城不足十公里。她这样讲述：“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一座坟冢和一个墓碑。村里村外、满山遍野只见古树参天、森林覆盖。”原来岜沙人历来实行“树葬”。于是，她详细地给我们描绘整个“树葬”过程；人死后，不做法事，不摆道场，不开追悼会，也不搞遗体告别；尸体稍作处理，绑在竹竿上就抬去掩埋，随即在上面栽树。

兴许，杨家鸣从这里得到启发，竟然“安排”起自己的后事，《墓地随想》一篇中，她说她死以后，连骨灰盒都不需要。不过，她毕竟是女子，天性浪漫，好美爱美。所以对家人提出：“请求将我的骨灰深埋进一个土坑，然后在土堆上面栽下一棵会开花的大树，最好是红色的大茶花和大花杜鹃。”让她的生命在这花枝上复活。

阅尽春色，看透生死，一种大醒大悟！

在如何对待生命和死亡的问题上，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品行品质和品位，因为它是人类意识和现代意识最本真最直接的体现。我真希望那些在当今时代，仍然执迷不悟大搞豪华墓葬，劳民伤财占据宝贵的土地资源建“活人墓”的人，能够读一读杨家鸣这些作品。这是不可多得的绿色，环保，健康的精神营养素。

超越一切狭隘的界限世俗圈子和固有的思维模式，回到古朴简单的人类立场，平静地去观察和思考我们面临的一切。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生命奥秘的求索，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反思，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和忧虑；这是杨家鸣近年作品中，弹射出来的精神之光，也是引起我注意的地方。我顶她，就跟顶那个年轻的女歌手是一样的，我真心希望从她们身上发出的光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

除了上面这些已经选进集子的散文随笔，还有几篇报告文学，杨家鸣说，报告文学不想编进去了。我告诉她，先看看再说。

这些年，报告文学的口碑不太好。

问题不在报告文学，关键在于写什么，有没有注水？有没有造假？或者往里面整“三聚氢氨”！

一共六篇报告文学，主要是写人物，国有企业老总，私营企业老板，农村支部书记，返乡创业的农民工。

杨家鸣显然花了工夫，写得很苦。跟她的散文大不同，写散文她笔墨放纵，挥洒自如；跟飞机播种差不多，飞到哪里，她就写到那里，压根不受什么束缚。

这几篇东西，看得出来，她相当谨慎，亦步亦趋，生怕出错一步一个脚印，顺着人物成长轨迹，录像似的一路跟拍，拘谨得很。

她写那个给温家宝总理上书的农民工张明富，差不多是由他的少年时代说起。“十多岁时，他见到生产队的庄稼地经常遭到野兽糟蹋，便自己动手制作了火药枪，并且叫上哥哥，自告奋勇地为集体义务看守庄稼地”，“17岁考入遵义县新蒲中学高中就读”；因为家中“顶梁柱的母亲忽然生病卧床不起，家庭主要劳动力的爷爷干农活时意外摔死，接着奶奶又病故；”他只好同哥哥一起出去打工，“险些就丢了性命”；“1991年他带着打工积攒的几万元钱，回遵义做起了副食品和化妆品批发生意”；“1998年，张明富夫妻俩在香港梦多娜化妆品公司的支持下，投资250多万元，注册成立了贵州梦丽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2007年，张明富所在的团泽镇鹌鹑产业面临危机，镇政府想到了张明富，希望由他来引领这个产业的发展。他经过多方考察，筹集500多万元资金，以“梦润”品牌创办起“贵州梦润鹌鹑有限公司”。建立起一个以鹌鹑养殖为主业包括优质玉

米基地建设在内的饲料生产、种苗供应、蛋肉加工、有机肥生产及技术服务成龙配套，循环经济模式的农业产业化企业。

2009年，张明富这两个企业创造的产值达到一个亿。在杨家鸣带领下，我也去了现场；跟这个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照了面，也亲眼见到了他的工厂。我把这称之为，对她的报告文学产品的抽样调查。

杨家鸣这几篇报告文学，反映的内容是可信的。

六篇报告文学，六个主题人物，各有特点，但共性明显。

其一，都是在改革开放中敢于创新的创业型人物，成功人士。

其二，志存高远，目标明确，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事业心。

其三，务实创新，艰苦奋斗，历尽磨难而百折不挠。

其四，自觉的充电意识和较强的学习能力。

读完，我就想：如果对这些人物的采访再深入一些，面再广一点，视角不妨多几个；东西整个拉出来后，再仔细清理和完善。没准，能整出一部新时代的“创业史”，成为我们遵义本土的“MBA”教材。如果是那样，就有点意思了！“教材”和“励志”一类，是当下受欢迎的读物；千千万万正在创业和准备创业的年轻人，需要来自本地的借鉴和参照。

时代需要创业者，时代同样需要真实反映创业生活的报告文学。

.....

杨家鸣的写作本真诚实，正道直行。对人世间的是是非非纷纷嚷嚷，心里有杆秤；称过后，她会如实报数，不短斤少两，不虚情假意。有时难免走眼，把数报错；但她敢于认帐，纠正也快。

这是一种文学追求，也是一种人生态度，挚着而朴素。正因如此，她看到了文学的高度和难度，渴望着新的攀登和坚守。

由她的身上，我看到一个文学女性在以自己的文学实践，顽强地同现实社会的世俗战斗；固守着人类精神的底线，不屈不挠地捍卫着心灵的高贵和尊严。